

如何评价柳亚子

王晶珏

柳亚子一生特立独行，名满天下；而生前身后，遭遇坎坷，也很不寻常。他是同盟会元老和国民党要人，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两次险遭逮捕，一再逃亡，终于被开除党籍，艰辛备尝。他热血满腔，长期为新中国奋斗，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应邀到北平不久，却一度要退隐回乡，并以屈原、贾谊的遭遇自况，甚至联想到苏联诗人叶赛宁悲剧性的结局。在他身后，尽管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诬陷的“反革命”罪名已经昭雪，但是在“牢骚太盛”的批评之后广为流传的不实之词和疵议诟病，多年来一直深入人心，迄未澄清。不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长期不被承认，而且，在国家纪念历史人物的工作中，柳亚子是不是值得纪念，直到现在，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大量事实说明：柳亚子始终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坚定的民主战士，和不朽的革命诗人。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和文学生涯中，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以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高风亮节，日新又新、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和慷慨淋漓、独树一帜的文章诗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尊敬，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
- 本文是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柳亚子选集》序的一部分，原注中的项目已收入该书的，不再一一标明原始出处。

一、高举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旗帜，奋斗终身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人物，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无不高举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面旗帜，奔走呼号，奋斗终身。柳亚子正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继承中国历代忠烈、特别是晚明东林党、畿社、复社爱国志士的传统，又深受世界各国民族英雄的鼓舞，一贯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积极鼓吹民族独立。在“五卅”运动时反英，“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抗战结束后反美，都十分坚决。1947年底，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从防御转入反攻，“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业已确定的形势下，他独树一帜地声明，自己虽然一贯主张亲苏，但决不“盲目亲苏”。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万一苏联有一天改变政策，不以平等待我，……当然我们也要反对。”他拥护反美，但不主张“盲目反美”，他说“我们不反对华盛顿、杰克逊、林肯、威尔逊、罗斯福的美国。”“我们所反对的，只是……美国的军阀、财阀、政棍、党痞。”^①

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等民主性思想的熏陶，后来又接受西方民主学说的巨大影响，在16岁时（1902年）读了卢梭的《民约论》之后，很快就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后来终身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介石，都是为了彻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传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对一切旧势力、旧风气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他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1947年又坚决反对国民党民主派搞军队，以防反民主的旧势力乘机复辟。他说，“一揽（搞）军队，一般官僚、军阀、政痞、党棍之流，他们都会摇身一变，化作民主分子、进步

^① 《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1947年12月9日）。

分子，到党内来把持一切，而真正的民主分子和进步分子，反被排斥到外面去。”^① 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看到许多“不顺眼的事情”^②，随即清醒地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和百余年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此，他仍然继续“忙于和人家斗争，几乎喘不过气来。”^③ 直到身患重病，才不得不停止战斗。

二、“不做新顽固，永远向前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家学说中这个十分珍贵的思想，是柳亚子终身坚守不渝的重要信条。他说：“我们大家要有这种精神才好。不然，恐怕新的变旧，又要归于淘汰之列了。”^④

柳亚子一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三次重要转变。第一次，在辛亥革命前。他从一个拥护康梁改良主义的“自命的维新党”，转变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第二次，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在思想和政治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变化。在文化思想和文学方面，从先前不敢公然反对孔夫子，转变为公开拥护“倒孔”，从反对白话文、留恋旧文学，转变为赞成白话文、支持新文学，并和南社中反对新文化的大多数人“分家”，另组新南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方面，他在坚信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同时，也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崇拜马克思，私淑列宁，向往社会主义。他从信奉旧三民主义，转变为拥护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参加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推进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后来又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民革”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三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及

① 《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1947年12月9日）。

② 《给尹瘦石的信》（1949年4月11日）。

③ 《给柳无忌的信》（1950年12月18日）。

④ 《新南社成立布告》（1923年10月19日）。

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他的看法和主张又一步一步不断发展。1947年12月初,当国民党民主派正在香港筹备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他曾主张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后,由国民党民主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成立“会议制”的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主康乐的三民主义新中国”^①。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劳动节口号中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柳亚子随即和冯裕芳、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等在香港的民主人士125人联名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他们说:这个提议“证明了中共并不如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企图再来一个一党专政。……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②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即认为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说:“中共领袖毛主席,实为真正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自反帝、反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及耕者有其田诸口号,凡中共所揭橥而实行者,无一不与孙先生政策相符。其倡导之新民主主义,亦从三民主义中扬弃而来,为现阶段必然发展之途径。”^③他虽然坚定地信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但对其中不足之处也曾一再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基于这些认识,他在建国之后,就明确地承认新民主主义也是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思想^④,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⑤。

这几次转变,说明柳亚子的一个重要特点: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他也不断地前进。“五四”以后,他曾经劝告同盟会和南社的一个老友说:“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

① 《再来一次新政协》(1947年11月5日)。

② 《与冯裕芳、茅盾等在港各界民主人士125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4日)。

③ 《恭谒孙先生之灵堂有感》(1949年5月5日)。

④ 《孙总理与毛主席》(1950年11月上旬)。

⑤ 《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奋勇前进!》(1950年12月10日)。

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①随后，他又郑重地宣布了自己的行动准则：“不做新顽固，永远向前走！”^②

三、坚持国共合作，主张多党合作， 做共产党的诤友

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现代史的中心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极为重要。能否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祸福和民族的兴衰。柳亚子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有口皆碑。

柳亚子始终坚决拥护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堪称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的典范。孙中山逝世后，他和共产党人密切配合，抵制西山会议派和蒋介石先后发动的反苏反共活动，因此，在蒋介石实行清党时险遭逮捕杀害。抗战时期，他为了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谴责国民党当局围歼新四军，因而被开除党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使中国重新陷入灾难的深渊。为了挽救危局，他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谭平山等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又和李济深、何香凝等共同组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负起继续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任务。同时，他也主张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展为“全中国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暨民主人士的多党合作”^③。

柳亚子坚持和主张的国共合作和多党合作，是一种真诚的、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和许多共产党人共事中，以及和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长期交往中，都有生动的表现。他一贯尊重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同时对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

① 《给吕天民的信》（1924年6月16日）。

② 《〈新黎里〉复活周年纪念感想》（1924年8月1日）。

③ 《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国际宣传决议（草稿）》（1947年12月）。

采取直言无隐的态度。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对中共上海组织在处理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得到中共领导机关的重视并加以纠正^①。1945年正当他在重庆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友好交往十分密切之际，他表示：“我虽同情中共，但我只能做中共的‘严师诤友’”^②。1947年12月在香港时，他对知交郭沫若提倡的“尾巴主义”口号，坦率地表示不同意，仍主张“只做中共的严师益友，而不做他们的尾巴。”^③1949年春到北平不久，他对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际表现出来的“忠言逆耳”的态度，感到难以理解，曾尖锐地以“旭日中天防食昃”这一诗的语言，首先敲起了警钟^④。建国之后，他认为中共已经进入城执政，工作中“不讲效率、速度”的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亟需改变^⑤，他为此曾多次向周恩来和齐燕铭提出批评建议。他根据多方反映的情况，了解到在华东新区，主要是苏州反霸运动中有若干无辜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同盟会会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会员和其他民主人士），被斗争、逮捕、判刑甚至被杀，还有许多人外出逃亡。他认为运动“有偏差”，有“流氓地痞在中间乱搅”，于是又“不计后果”地向毛泽东和华东行政委员会反映情况，再次进“逆耳忠言”^⑥。1950年10月初，镇反运动开始后，他听到贸易部有一个青年女干部“无端被捕，又不公开”，甚感“骇异”，就立即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贸易部副部长长沙千里，请他们加以“调护”，希望此案能够“水落石出”^⑦。（据说这个冤案直到三十九年之后才

① 《中共上海区委工作通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20页。

② 《答客难》（1945年12月24日）。

③ 《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1947年12月9日）。

④ 《三赠刘仁同志女英雄》，（1949年6月6日）。

⑤ 《给毛啸岑的信》（1949年11月27日）；《与齐燕铭书》（1950年11月）。

⑥ 《给毛啸岑的信》（1950年1月22日）；《获病骤喜而呈毛主席两律，即次其韵》（1949年5月21日）。

⑦ 《北行日记》（1950年10月5日）。

彻底平反。但当时由于柳亚子的干预，总算保全了一个无辜的共产党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正当共产党进行整风之际，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李济深为一个宗教界人士抗诬，柳亚子表示支持，但陈其瑗、刘清扬“独持异议”，他对陈感到“殊为失望”^①。几天之后，他又在赠刘清扬的诗中，提出坦诚的批评和劝告：“一唱雄鸡白日中，危言无罪圣人聪。劝君莫作模棱语，领袖忧劳重整风。”^②这首诗，说明了他当时对毛泽东仍寄予很高的信任和期望，也说明了他说到做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净友。

国民党的元老大都是柳亚子的老朋友，他对其中的保守派人物，以及蒋介石本人，一向都“不计恩怨之私”^③。每当他认为他们的行事符合孙中山遗教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他莫不竭诚拥护。在“一二·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他曾一再写诗、草拟电文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和国民党其他要人的抗战决心和辉煌战绩表示欣慰，并寄予厚望。他主张，为了救中国，对于任何愿意拥护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都应该“不追已往，维策来兹”^④，一律加以团结。

四、以诗歌鼓吹革命，纪录历史

柳亚子以诗歌鼓吹革命，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感情之热烈、影响之广泛，在中国近现代诗坛上没有第二人。他的诗，得到中国知识界、包括许多著名新文学家的普遍称颂，也得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一致推崇。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倾向和形而上学观点，以及一条日益发展的“左”的文艺路线的支配，“五四”以

① 《北行日记》（1950年10月5日）。

② 《刘清扬大姊索诗，写赠四绝》（1950年11月11日）。

③ 《纪念总理诞辰，呼吁制止内战》（1945年11月8日）。

④ 《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宣言》（1947年11月）。

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近现代部分，对柳亚子和他领导的南社，大都略而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三次全国文代会，对柳亚子及其诗作，更一字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后，情况依然。仅有个别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最简略地提到柳亚子在清末作为南社盟主的地位和他的一两首诗，而对他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多年间的大量作品，却完全不予理会。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才开始明确地肯定了柳亚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现在谈继承遗产，应当从《诗经》、《楚辞》直到章太炎、柳亚子；我以为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①

柳亚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1. 主盟南社，开创一代革命诗风

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柳亚子是三个发起人之一，并以顽强的献身精神长期主持社务，成为公认的南社盟主。他团结了一大批时代歌手，鼓吹反清、反袁、反军阀，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以诗歌鼓吹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他一直是南社革命精神的倡导者、保持者和鼓舞者。“南社风流垂史册”^②，是和柳亚子完全分不开的。

柳亚子又在诗歌风格方面对清末民初盛行的几种拟古主义诗派高举叛旗，决心要别创一宗。由于时代潮流奔腾前进，这个愿望未能实现^③。但是，他和战友们“首先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南社因而号称同盟会的宣传部。他们的作品“活泼淋漓，有少壮朝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

① 茅盾：《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人民文学》1979年11月号。

② 赵朴初：《柳亚子先生文集出版志喜》（1983年）。见《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③ 柳亚子：《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1933年6月1日）。

生。”^①“于思想言，为革命之前驱，有骤然不可抵挡之气势；于文艺言，开解放之先路，有肆然不受拘束之情形。”^②他们所开创的一代革命诗风，几十年来不断得到许多旧体诗人、新体诗人的一致承认和赞扬。

关于柳亚子诗的风格，他自己说：“我论诗不喜艰涩，主张风华典丽；做诗不耐苦吟，喜欢俯拾即是。我觉得我的诗从二十岁以后到最近，始终是一贯的。”^③从少时就喜欢柳诗，后来又成为诗人至交的宋云彬说：柳诗“多感慨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我尝把他比陆放翁……。柳先生似乎满肚皮都是诗句，兴会来时，一下子就做好几首。往往有人请他题诗，一面用笔蘸墨，一面想，不过两三分钟，就写出来。”^④早就敬佩柳诗的著名新诗人萧三，说柳亚子的诗“热情奔放，独树一帜。”又说他是“国士无双”的“一代诗人”^⑤。

2. 提倡“诗人要有气节，诗人要有思想。”

柳亚子主张“以人论诗”^⑥。他对历代重气节、有思想的爱国的、进步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谢皋羽、郑所南、顾炎武、夏完淳、龚自珍，以至“五四”以来的吴虞、鲁迅、郭沫若、林庚白、沈钧儒等人，无不“因其人而重其诗”^⑦。他在清末民初坚决反对王闿运、郑孝胥、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等人的诗派，多半因为他们是“接近清、袁的诗人”。他痛恶同光体诗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为盗臣民贼之

① 曹聚仁，《纪念南社》（1936年）。见《南社诗集》第一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6年版。

② 胡朴安，《南社丛选自序》（1924年）。见《南社丛选》，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版。

③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1933年6月1日）。

④ 宋云彬，《柳亚子》，见《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37年版。

⑤ 萧三，《国士无双—亚子》，见《柳亚子纪念文集》。

⑥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1933年6月1日）。

⑦ 《柳亚子的诗和字》。（1945年10月16日）。

功狗”，因而大力提倡“不事王侯”的“布衣之诗”，和他们对抗^①。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他又指出：在读书人和诗人当中，有的人“为一代正气所钟，蔚为民族的光荣”，而另一些人为了“取媚达官”，“无耻地拍马屁”，竟然“吮痂舐痔，无所不为”。因此，他再次大声疾呼地提出了“诗人要有气节，诗人要有思想”的响亮口号^②。

诗人柳亚子一生提倡气节和思想，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树立了出色的榜样。而他写作的大量悼念表彰革命烈士、志士的诗文和传记，以及花了许多精力编印的革命烈士和南社社友的诗文遗集，更成为提倡气节、鼓舞斗志的生动教材。

3. 写了一部“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革命史诗

“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柳亚子认为，用宋代词人陈亮这两句稍经改动的话来代表自己的诗，“可以当之而无愧”^③。他说：“我的诗，不是靠的文学而传，还〔却〕是靠我在历史的使命而传。”^④他的历史使命，有两个方面：一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诗歌作为“宣传的利器”，在中国鼓吹民主革命；一是效法杜甫，写作“诗史”，以诗歌纪录时代，“留当年诗史看”^⑤。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陈叔通曾评论说：柳亚子“四十年来奔走革命，一以主义为归，与恶魔搏斗，所遭至困，顾未尝废诗。”他指出：柳诗“完全为时代性之作，有美有刺。……谓之为诗可也，谓之为春秋可也，诗与春秋一也”^⑥。建国以后，柳亚子的诗被冷落了二三十年，更谈不到有人承认他的史诗。还是茅盾，在1980年又再一次明确指出：“柳先生的诗，反映

① 《胡寄尘诗序》（1911年）。

② 《旧诗革命宣言书》（1944年5月4日）。

③ 《柳亚子的诗和字》（1945年10月16日）。

④ 《给曹美成的信》（1944年9月30日）。

⑤ 《汉家行》（1944年5月11日）；《咏史四首》（1916年夏）。

⑥ 陈叔通：《光明集序》（1949年5月19日）。见《磨剑室诗文集》。

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①。

现在，内容丰富的柳亚子诗词全集《磨剑室诗词集》两巨册已经出版。人们即使只能读到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也可以清楚地感到，诗如其人，借用40多年前桂林文化界评论柳亚子人品风格的话，说他写出来的是一部“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史诗，也是非常恰当的^②。

4. 旧瓶新酒，继往开来

“五四”以后，柳亚子坚信“白话文一定要代替文言文”，“新诗一定要代替旧诗”^③；随即另行组织新南社，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新诗。从1930年至1950年间，他曾先后写过几首新诗和拟民谣。但是又感到对新诗实在太陌生，终于未能走上新体诗的道路。他认定旧体诗是他的熟练的工具和进行革命宣传的武器，在“旧诗的功用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还不想放弃这个武器，仍要运用它继续奋斗^④。

在理论上提倡新诗，而在实践上却继续天天写旧诗，他自己也承认是矛盾的。但他说明，他写旧诗是用“旧囊盛新酒”的办法，“以新思想熔铸入旧风格之中”^⑤。茅盾后来也指出：柳亚子“虽然用文言写旧体诗，可是思想内容完全是新的，比起专写新诗的朋友们的作品来，反而更加新了”。他认为柳亚子“是彻底实行了‘旧瓶装新酒’的诗坛革命家”^⑥。

① 茅盾：《柳亚子诗选序》（1980年7月10日）。

② 《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祝寿》，载1944年8月3日《解放日报》，当时参加祝寿的有田汉、梁漱溟、千家驹、熊佛西、金仲华、宋云彬等一百多人，大家一致认为柳亚子“是一个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革命诗人”。

③ 《新诗和旧诗》（1942年8月25日）。

④ 《柳亚子的诗和字》（1945年10月16日）；《旧诗革命宣言书》（1944年5月4日）。

⑤ 《旧囊新酒》（1941年）。

⑥ 茅盾：《柳诗、尹画谈后献词》，见1945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

柳亚子决不抱残守缺，而是志在继往开来。他希望以旧瓶装新酒作为桥梁，进而发展到新瓶装新酒，“结束三千年中国旧诗”，过渡到新诗^①。早从30年代开始，他就对新诗的发展方向问题一再提出过主张。他认为：新诗的创作原则，应该是“容易做、容易懂、容易记”，体裁应该是“有脚韵的自由诗”，语言要“用道地的普通话，不要搀入艰涩的文言或欧化的语体。”^②他更“不赞成把外国诗体移植到中国来”^③。他殷切希望，新诗这块新的园地“能够培植出葱笼的树木和明艳的花卉来”^④。

1961年，田汉在柳亚子生前手书的一本诗册后面题了一首五言长诗。诗跋里说柳亚子是中国“近代稀有的爱国者，……诗篇多不朽之作，不随流水以逝。”诗的结尾四句是：“江河流日夜，磐石耸如砥。诗人柳亚子，永在人心底！”^⑤后来有人评论说，这首诗是对这位诗人最恰当的“盖棺论定”^⑥。

五、“史述南明志悲壮”

“删诗圣手削春秋，史述南明志悲壮。”这是郭沫若1943年春寄赠柳亚子祝寿诗中的两句。柳亚子逝世后，他又说：“柳亚子先生不仅是一位革命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革命的史学家。”^⑦从柳亚子毕生研究南明史的活动看，这个论断完全符合实际，也是中肯的。

柳亚子终身不渝的研究南明史的学术活动，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目的，起先是为了通过宣传南明亡国的惨

① 《旧囊新酒》（1941年）；《与齐燕铭书》（1950年11月）。

② 《对话体诗的我见》（1932年11月8日）。

③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1933年6月1日）。

④ 《新诗和旧诗》。

⑤ 田汉：《题〈黄初雨响集〉》，见1981年3月20日《团结报》载郭沫若《田汉、沈尹默诗论柳亚子》一文。

⑥ 陈述冬：《盖棺论定柳亚子，压卷诗篇田寿昌》。见《柳亚子纪念文集》。

⑦ 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1959年4月9日）。

剧，以及抗清英雄们的爱国精神和壮烈牺牲的事迹，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后来则进而为了纠正中国传统史学中一个最大的“曲笔”，弥补正史中一个严重的缺失，立志要在二十五史之外，再编著一部“事信而言文”的《南明史》，列入正史之中，以完成300年来许多著名史家的“未竟之业”^①。

辛亥以前，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扬南明史事，鼓吹反清革命的热潮中，柳亚子16岁时头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郑成功传》，立即得到著名革命家和权威学者章太炎的高度评价。他随后陆续写作的《中国灭亡小史》、《台湾三百年史》、表彰南明著名的抗清民族英雄的传略和咏史诗，都充满了振奋人心的爱国热情。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史学界和文艺界再度兴起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的高潮。1939年至1947年，柳亚子在上海、香港编写了《南明史纲》、《南明后妃宗藩传》两部书稿，和南明抗清人物传记多篇。南明史专家谢国楨说：柳亚子此时“专治南明史乘，不畏权威势力，发扬民族气节”^②。又有人记述说：当时文化界人士对于柳亚子“在史学上致力之勤，备极赞扬。”^③

柳亚子要编写三本南明史料书的计划，被太平洋战争所打断。他到桂林后，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重整旗鼓。1943年夏，他联络同志，发表了《南明史编纂意见书》，指出清朝官修的《明史》，对历时40年的南明历史的处理和记述，“诬诋任情，大悖实录”，是自来史家最大的“曲笔”。他建议在国民政府的国史馆内设立机构编纂《南明史》，结果未能实现。次年，他自行组织了民间学术团体“南明史料征纂社”，准备着手工作，又因战局的变化，再次受阻。

柳亚子对他的“南明史宿愿”，矢志不渝：“此身一日不

① 《南明史料编纂意见书》（1943年6月）。

② 谢国楨，《〈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

③ 王瑞丰：《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见《柳亚子纪念文集》。

死，此心亦一日耿耿不忘。”^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满怀热望，一再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建议，竭力争取在中央文史馆内设立机构，以便完成这项工作。最后，他又决心在1951年写成一部南明史（依章太炎早年的主张，拟改名为《后明史》）。但是，因文史馆事“颇多周折”，“无米为炊”，编写工作难于着手。从1951年年初起，他“脑病复发，情况低沉。”从此即未恢复健康。他一生的宿愿，仍然未能实现，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一大遗憾。

柳亚子早先编著的《南明史纲、史料》，现已收入《柳亚子文集》，尚待出版。他一生在南明史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仍是十分值得珍视的。

六、他的人品比他的诗文更可贵

柳亚子的诗文可贵，他的人品更可贵。有人说，他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的优良传统，又接受了“西洋精神文明的熏陶”，形成了“真实”、“诚意”、“热情”的素质，他的做人的态度很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②。柳亚子本人也承认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既很广泛，又很深刻。他说，他只是反对儒家学说中三纲五常的封建毒素，但它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信条，他都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③。

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真理和社会进步，柳亚子既敢直言不讳地批评任何人，更勇于毫无顾惜地解剖自己。他的未完成的自传、回忆录、日记，还有有关的书信和诗文，实际上构成了这位“亚洲卢梭”自己的一部《忏悔录》。他十分坦率

① 《与朱荫陞书》（1950年10月14日）。

② 林北丽《柳亚子先生的为人比他的诗文更值得珍贵的一面》（1944年5月30日）。见《柳亚子纪念文集》。

③ 《写在林北丽文章后面的附跋》（1944年7月18日）。

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底矛盾的人”^①，既充分肯定了本人的品德和才能，也对自身的弱点和过错作了一系列真诚的忏悔。例如，在回顾南社的历史时，他对自己在1917年闹出来的引起轩然大波的驱逐朱鸳雏的公案，追悔不已，深感良心痛苦，终于在1936年公开作了“忏悔的告白”^②。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他更作过许多痛切的反省。袁世凯窃国后，他痛苦异常，一度沉溺于妇人醇酒和歌舞丝竹，老友陈子范曾当面批评他“玩物丧志”；不久，陈在反袁斗争中壮烈牺牲，他回想起来十分愧疚^③。1927年以后，他患了神经衰弱症。许多革命者和文化战士前仆后继，英勇壮烈地进行的反蒋斗争，他大都未能参加。当时他就不断责备自己“在矛盾中生活”，“既怕死，又怕吃苦”，是“临阵脱逃的渺小者”^④。事隔多年之后，他还常常痛悔草间偷活，愧对死难故人。1935年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之后，他还是没有投身大时代的勇气，只做了一个“可怜的旁观者”。后来，他因为没有在抗战初期替国家民族尽过流血流汗的责任，一直感到惭愧^⑤。

1949年2、3月间，柳亚子无比欣喜，满怀豪情地应邀北上参加建国大业。但是，他刚到北平不过十天，就写诗向毛泽东表示要退隐回乡^⑥。毛泽东在和诗中批评他“牢骚太盛”。及至6月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后，他的情绪更加低沉，竟至写出令人十分惊诧的一首诗：“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杆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⑦。从7月下旬起，他神经衰弱症复发，百事俱废，“一筹莫展”^⑧。诗词写作和日记，都中断了一

① 《旧诗革命宣言书》（1944年5月4日）。

② 《我和朱鸳雏的公案》（1936年1月2日）。

③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1936年1月20日）。《剧场感泪两绝》（1914年）。

④ 《给姜长林的信》（1931年5月5日，10月24日，12月24日）。

⑤ 《八年回忆》（1945年9月）。

⑥ 《感事呈毛主席》（1949年3月28日）。

⑦ 《口号答云彬》（1949年7月16日）。叶赛宁，农民家庭出身的苏联青年诗人，十月革命后曾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1935年因悲观失望自杀。

⑧ 《与朱荫庐书》（1950年3月24日）。

年多。其心情波动之大，可以想见。

对于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几十年来社会上议论颇多，见解不一。现在看来，当时出现这一段插曲，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他牢骚满腹，主要并非由于汽车、房子等生活礼遇问题，至于说他“要颐和园”，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和任意破坏名誉的不实之词。请他住进颐和园，也并不是因为他需要“养病”。他到北平不久，在无比兴奋之余，忽然面对南京政府土崩瓦解、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完全缺乏思想准备。他出席全国文代会筹委会时，不能参加常委工作，在新成立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中，这个名满天下的革命诗人，仍被排除在外。他向毛泽东建议设立机构，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史等专史，并希望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中有个职位，也被“泼冷水”。更加突出的是，随后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他作为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竟又不能代表民革参加筹备工作。他只好遵毛主席之命“在颐和园静养，不问一切外事”^①。凡此种种，对于象柳亚子这样一个用世之心很强、自尊心也很强的革命活动家说来，在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建国大业中，感到竟被完全闲置起来而难以忍受，因而血压升高，生气骂人，是不难理解的。当然，主观原因也是有的。他当时的以及早先的许多自省，对本身的弱点和不足，都有深刻的剖析和清醒的认识。他曾不止一次承认，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名士气，“目无余子”，“狂奴”故态；脾气本来就on不好，到北平后更是“愈来愈躁，喜欢骂人”。此外，他早就承认自己是“书呆子”，“不能做实际工作”；这些情况，当然也不免要影响人际关系和工作安排。

9月下旬，柳亚子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又逐步参加政治活动，写作

① 《给曹美成的信》（1949年7月15日）。

诗词歌颂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国庆。虽然他担任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荣誉职，但他却责无旁贷，积极主动地对党政工作提出许多直言无隐的批评建议。可是不幸，从1951年1、2月份起，他因患脑动脉硬化症，各项活动急剧减少，不能继续工作。因此，他对自己“欲借头衔荣父老”的士大夫式的虚荣心，和住进颐和园“皇宫”和北长街“王侯第宅”时的陶醉心情，也没有来得及冷静地进行回顾和反省。但是，“我愧陈登百尺楼”^①——他在一生的最后一首诗里写的这句话，恐怕并非出于偶然，更不是泛泛的谦辞和客套，而是透露了他对于自己在革命胜利后也不免有“求田问舍”思想而感到的内疚和自责。

柳亚子一生敢于批评别人，同时更勇于忏悔自己，解剖自己，这不但无损于他的形象，反而更显示出胸怀的坦荡和人品的高尚。如果他能活到今天，肯定会对历史有更多的反思，对现实有更多的评论，对自己有更多的忏悔，而对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必将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夏良才）

^① 《赠谢刚主一首》（1951年2月13日）。